



21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西方经济 社会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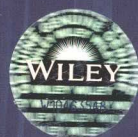


主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水雄 王建民

Xifang Jingji Shehuiyueshi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西方经济 社会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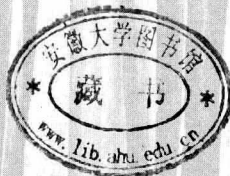
主 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水雄 王建民

Xifang Jingji Shehuixueshi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经济社会学史/刘少杰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
(21 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7155-5

I. ①西… II. ①刘… III. ①经济社会学—历史—西方国家 IV. ①F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0194 号

21 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西方经济社会学史

主 编 刘少杰

副主编 王水雄 王建民

Xifang Jingji Shehuixue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95 mm × 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定 价 49.80 元

字 数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一、方兴未艾的经济社会学	1
二、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	3
三、古典奠基时期的西方经济社会学	5
四、现代发展时期的西方经济社会学	7
五、当代深化时期的西方经济社会学	9

上篇 古典奠基时期

第一章 亚当·斯密的自由秩序论	15
一、学术背景	15
二、道德情操论	18
三、劳动分工理论	21
四、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政府职责	24
五、小结：“亚当·斯密问题”	27
第二章 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实践论	30
一、学术背景	30
二、实践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	33
三、以实践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结构	36
四、经济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	40
五、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批判	43
第三章 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	47
一、学术背景	47
二、经济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	50
三、作为道德现象的社会分工	52
四、社会团结的危机与应对	56

第四章 齐美尔的货币文化论	61
一、学术背景	61
二、分析对象与分析层次	63
三、辩证的社会文化态度	65
四、货币的社会影响	70
五、小结：在社会相互作用中看待货币	78
第五章 帕累托的非理性实证论	80
一、学术背景	80
二、非逻辑的社会行为	83
三、支配社会行为的剩余物与派生物	86
四、精英统治循环论	88
第六章 韦伯的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论	91
一、学术背景	91
二、经济社会学的基本范畴与方法论原则	93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96
四、儒教伦理下的中国经济秩序	99
第七章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	105
一、学术背景	105
二、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108
三、有闲、消费与社会等级	111
四、现代社会的金钱文化	114
第八章 莫斯的礼物交换论	117
一、学术背景	117
二、礼物交换作为一种“总体的社会事实”	118
三、礼物交换作为一种“全面呈献制度”	120
四、当代社会学中的“莫斯精神”	122
五、小结：“莫斯精神”的启示	125

中篇 现代发展时期

第九章 波兰尼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129
一、学术背景	129
二、经济的“形式”与“实质”的含义及特征	131
三、“虚拟商品”观念的引入及其对市场经济的颠覆	133

四、建构性市场经济与自发性社会运动	136
五、市场社会的终结与市民社会的成长	138
第十章 帕森斯的经济系统论	142
一、学术背景	142
二、对经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与定位	146
三、经济系统研究的推进	154
四、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帕森斯理论的穿透力	159
五、帕森斯经济社会学的遗产	162
第十一章 霍曼斯的人际交换论	165
一、学术背景	165
二、小群体的结构与功能	167
三、社会交换的基本形式	170
四、群体凝聚力与交换权力	172
第十二章 布劳的交换结构论	175
一、学术背景	175
二、社会交换的结构	177
三、社会交换中的权力结构	179
四、社会交换与社会宏观结构	182
第十三章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	186
一、学术背景	186
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认知基础	189
三、自生自发的经济秩序	191
四、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	196
五、对哈耶克思想的认识和延伸	200

下篇 当代深化时期

第十四章 加里·贝克尔的日常生活经济分析	207
一、学术背景	207
二、歧视与婚姻中的资源配置	211
三、犯罪的成本收益考察	214
四、时间分配理论与生育决策	218
五、社会相互作用和一般性成瘾	220
六、小结和讨论	225

第十五章 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嵌入论	228
一、学术背景	228
二、弱关系的力量	230
三、经济行动的“网络嵌入性”	232
四、对各种经济现象的新解释	234
五、集群行为的阈值漫射模型	236
六、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议程	239
第十六章 埃默森等人的网络交换理论	242
一、学术背景	242
二、埃默森的权力—依赖理论	245
三、库克的网络一般性交换理论	249
四、马科夫斯基关于结构性权力指数的研究	250
五、维勒的要素论	251
第十七章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	256
一、学术背景	256
二、分析单位与分析层次	258
三、概览：理性、权利交换与社会行动的结构	260
四、权利、权力与组织和集体行为问题	264
五、规范、社会资本与法人行动	268
六、权利控制与社会系统的变迁	273
七、简评：一个核心理论体系	276
第十八章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278
一、学术背景	278
二、资本理论的基础与演化	280
三、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与争论	284
四、互动基础上的理论架构	287
五、网络社会与社会资本	293
第十九章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297
一、学术背景	297
二、“此”经济人与“彼”经济人	300
三、公共选择视野下的利益集团、政府及官员	302
四、经济与政治互动中的公共决策规则	305
五、经济学与政治学相统一的宪法经济学	307

第二十章 卡尼曼等人的非理性预期理论	311
一、学术背景	311
二、理性选择研究的新视野	313
三、选择行为与感性选择	318
第二十一章 曼瑟·奥尔森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	323
一、学术背景	323
二、奥尔森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325
三、集体行动理论的后续发展	328
四、经济理性人假设的利与弊	332
第二十二章 阿玛蒂亚·森的社会选择理论	335
一、学术背景	335
二、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可能性问题	337
三、新理性观的建构与自由悖论的解决	339
四、经济学与社会学视界的融合	342
第二十三章 怀特的市场社会结构理论	345
一、学术背景	345
二、身份认同与控制	349
三、生产市场理论	351
四、关于经济现象的新结构社会学的发展	354
第二十四章 泽利泽的经济行为的文化分析	361
一、“替代路向”的文化分析	361
二、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	363
三、“相互联系的生活”观	366
四、小结：经济行为的非经济维度考察	368
第二十五章 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学	371
一、学术背景	371
二、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	373
三、符号消费与符号价值	376
四、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	378
五、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381
第二十六章 卡斯特的网络经济社会论	385

一、生平与学术背景	385
二、信息技术革命与新经济	388
三、网络企业与信息主义精神	392
四、信息化社会中的工作与就业	396
第二十七章 金融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	401
一、学术背景	401
二、金融领域和金融研究的新趋势	402
三、社会学金融研究的古典渊源	404
四、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领域的研究	406
五、超越嵌入性的金融社会学	411
六、结论	415
后 记	418

导 论

虽然经济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流行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在西方却有了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在难以分解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提出了很多至今仍值得深思和借鉴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经济社会学理论。如何清楚地把握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发源开端、历史演化、流派分化、基本观点、方法原则、学术创新和理论局限，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学巩固理论基础、提升学术水准、加快其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新形势下面对快速变迁的中国经济社会展开更广阔的理论视野，进行更具创新性经济社会研究的必要准备。

一、方兴未艾的经济社会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分化变迁。正是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复杂变迁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学和社会学都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学者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呈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热切关注，投入了大量科研精力，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大量问题难以在明确的学科划分中得到清楚的说明，必须超越传统学科界限，在经济与社会的综合中才能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于是，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综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经济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

同经济学和社会学一样，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原则大部分都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它一旦在中国社会找到了立足之地，就会以比在西方更加旺盛的活力展开自己广阔的理论视野。因为经济社会学的基本原则是把经济现象放到社会结构中把握，或在经济与社会的综合视野中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而经济与社会的联系程度在中国要比在西方紧密得多。因此，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构架和方法原则在中国找到了更加深厚的现实基础，遇到了比在西方更加广阔的适用空间；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也由此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显示了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社会学的迅速发展，不仅对于社会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经济学也有重要的支持。对社会学而言，经济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学研究摆脱边缘化探索了重要途径。社会学研究边缘化是长期困扰社会学的一个难以摆脱的难题，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家为了突破这个难题而焦虑。经济学是众多社会科学中发展最持久、扩展规模最大的学科，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的大规模发展，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是经济学始终面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经济活动，这使经济学提出的问题、阐述的理论和形成的各种对策，在社会生活中都赢得了中心地位。相反，社会学却远离了对经济生活的关注与思考，把自己的理论视野聚集在经济现象之外的一些社会边缘问题上，社会学研究的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如果同经济学联系起来思考，社会学边缘化的难题便迎刃而解。

事实上，经济现象一定是社会现象，经济现象一定千丝万缕地同社会结构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经济学不可能对经济现象中的种种问题都做出包揽无遗的恰当解释，社会学完全有必要、有能力把企业和市场等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因素同社会因素紧密联系起来，开展具有自己特殊视角或独到见解的研究，而这正是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主张。如果社会学能有效地从经济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中对经济现象开展研究，就意味着社会学可以突破长期游弋在社会生活边缘地带的窘境，实现从庭院走向堂奥的摆脱边缘化的理想。^①

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成果，对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经济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其自身也有许多弱点，其中一个经常被其他学科批评的欠缺是：经济学的很多研究太过于理想化，甚至经常脱离实际。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也不讳言经济学研究的理想化。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曾经指出，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不是得自经验，它先于经验”^②。正是因为经济学的很多观点并非基于经验事实做出的描述或总结，而是依据逻辑推论得出的经济运行模式和效率最大化的经济行动方案，因此它既获得了以理想模式对现实经济生活加以导引的意义，同时也容易脱离实际。经济社会学强调把经济现象放到社会结构中去把握，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观察和思考各种经济问题，其结果是把经济学指向理想的追求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进而使关于经济现象的研究对现实形成更有效的引导作用。

开展深入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推进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快速增长且复杂分化的时期，如何保证经济在协调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持续地发展，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普遍面临的尖锐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它是在不平衡发展、差异化提高中获得的，其结果是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状况的失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利益关系紧张、群体冲突加剧、贪污腐化严重、官民矛盾突出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这些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只有从经济社会学的综合性视野中才能得到明确的符合实际的回答。

这里强调经济社会学研究对于回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重大意义，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可以有效地完成这种任务的能力并且已经做出了这种贡献。一方面，应当肯定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

^①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还应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学的起步较晚，比较年轻的研究队伍还存在经验不足、发展有限的问题。因此，如何提高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能力，更加积极地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已有基础上获得更加稳定、更加健康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共同为之努力的首要问题。

寻求一个新兴学科的健康发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承继学术发展传统，吸收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思想精华，应当是新兴学科谋求健康发展的前提。如前所述，经济社会学的思想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学者的理论著述，因此，系统地考察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厘清其理论形成和演化的背景与线索，概括各种学说流派的基本观点、方法原则、学术贡献和理论局限，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学更积极地吸收优秀思想理论资源，以更深厚的理论基础去更有效地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问题，开展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统观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形成与演化，可以把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历史划分为古典西方经济社会学、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学和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这种划分是对西方经济社会学发展史的一种历史分期，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西方经济社会学提出的重大问题和形成的理论学说，而且还可以看到西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演化逻辑和方法原则的变迁。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本书每章介绍一位在西方经济社会学史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生平、主要思想观点和方法原则做概括阐述，这可以被视为更深入地研读西方经济社会学思想理论的一种导引。

二、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

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与经济学的交流与对话。更为重要的是，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在坚持核心的经济人概念和理性选择假设以及演绎分析方法的同时，也经常从社会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思考。他们的思想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宝贵的知识来源。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作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提出了经济学“理性人”的核心概念，但他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秩序”，他强调“开明自利”的理性，主张经济行为是自利但不自私的，并因此能够产生利他的意外后果，而且道德情操与同情心对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斯密对于道德情操的强调影响了后来的道德经济学家，例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的伦理经济学思想。西斯蒙第（Jean Sismondi，1773—1842）指出，村社、行会对经济自由竞争与贫富差距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不是财富，国家应依法对经济财富进行管理与分配，经济行动者应以良心代替工具理性。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的效用价值论认为，物质产品与服务都是生产的结果，都具有某种效用，而三个产业都在生产效用。这些观点对于仅仅关注物质产品的经济学家来说算是大大进步了，为后人从社会心理等角度研究经济现象打开了重要缺口。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则初步指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认为贫困人口过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主张用历史方法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方法，认为不同国家的经济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其中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认为，社会、政治、精神因素与劳动一起，都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家庭制度、宗教教义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 1817—1894）明确提出用归纳法来取代演绎法，认为经济研究必须与法律、政治史、文明史以及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一个民族的历史以及不断传承的思想对它的经济具有蓝图式的影响，因此历史影响着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克尼斯（Karl Knies, 1821—1898）则指出，利益、财富、经济制度等都属于人的感觉世界的现象。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主张从历史与统计资料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与假说出发来分析经济，强调经济活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活动，也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生产、分配、分工与交换既属于技术的范畴，也属于道德的范畴，经济组织必须受到道德制约。历史学派还认为法律决定经济地位与契约关系，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等。

后来，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门格尔（Karl Menger, 1840—1921）提出的边际效用理论把研究重心放在消费而不是生产上，并用主观价值论取代客观价值论，强调了个人需求心理对于消费的影响。他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个人心理会受他人的影响，但从他以后消费研究成为经济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34—1910）则提出了一般均衡论，解释了价格不仅取决于价值，也是一种均衡价格，因此初步涉及了市场买卖双方之间与内部的博弈问题，为研究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及其对于经济现象的影响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与该学派关系密切的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 1889—1992）尽管主张自由秩序原理，认为民众对规则是无知的，但他在反对政府干预的同时，并不反对社会对于经济的影响。他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实际上强调了个人之间关系网络的重要性。

美国的老制度经济学派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 1857—1929）认为，是本能在促使人们进行经济行动，并形成特定的生活方式、社会习惯以及社会制度，而这些生活方式、社会习惯与社会制度又反过来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约束。他反对传统的经济学数量分析，主张从文化、社会心理、习惯等结构与制度角度来分析经济行为，特别是消费行为，并著有《有闲阶级论》，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1945）则强调了法律对经济的重要影响，而米切尔（W. C. Mitchell, 1874—1948）更是对制度因素的经济作用进行了经验的统计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主张经济学应研究人与财富的关系，反对抽象的经济人概念而主张一种普通人概念，认为追求满足与避免牺牲这两种心理动机决定了经济行动，经济因素之间存在连锁因果关系，而工业、市场和偏好的形成都具有社会性。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则概括了影响个人消费、投资与流动倾向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并认为非理性的冲动导致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集群行为的特征。与之相似，希勒（Robert J. Shiller, 1946— ）则提出了“非

理性繁荣”的概念，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 ）和特维尔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提出了非理性预期与决策理论，指出了“信心”对于投资、金融、银行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兴衰的重要性。

1937年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 Coase，1910— ）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对于市场、企业、产权等进行了新的解释。诺斯（Douglass C. North，1920— ）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意识形态、利益集团导致的路径依赖等对于民族—国家经济兴衰的重要影响。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32— ）、德姆赛茨（Harold Demsetz，1930— ）、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1914— ）等人则进一步分析了交易成本概念，提出了“企业专用性资产”和“中间经济”等概念。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一种机会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仍然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但是他们的这些研究为经济社会学强调社会因素打开了一个更大的缺口。新经济社会学甚至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即便是博弈理论，也日益强调“结构性博弈”，指出“博弈是在社会结构中展开的”，社会结构对于博弈具有重要影响。例如，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1938— ）强调了社区规范对经济博弈、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重要影响。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1932—1998）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则指出了理性的个体并不能带来集体的理性。此外，阿罗（Kenneth J. Arrow，1921— ）的信息经济学以及关于经济风险与认知决策的研究，也都十分重视社会因素的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尽管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经济日益排斥政府的干涉，而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不断扩张，但是整个经济学也出现了社会学化的趋势，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

从经济学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已经强调了宗教、情感、道德、心理、社区、历史、文化和制度等社会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并因此而不断地修正经济人假设与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特别是一些具有创见性的论述，不可回避地对社会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应当承认，很多社会学家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实质上是经济学关注社会问题、对社会学刺激的结果。

三、古典奠基时期的西方经济社会学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形成时期，通常称为古典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发生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大部分在社会学研究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社会学家，同时也对经济现象展开了成就显著的研究。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韦伯（Max Weber，1864—1920）、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等都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做了开创性研究的社会学家，因此，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可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开展深度挖掘。

马克思是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多种领域，他的很多思想理论被称为经济社会学，可能不会引起任何歧义。很难找到比马克思把经济与社会更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学者，并且马克思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考察经济与社会的矛盾运动，这更是同时代的学者难以做到的。他从实践出发，特别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根本立足点，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看做社会形态演化变迁的基本动力，并论述了社会形态矛盾运动的演化逻辑和历史进程，涵盖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各种层面。

由于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来考察经济社会现象，而实践又是动态的历史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且旨在改变对象、创造财富的社会行动，所以从实践出发，不仅要在发展变化中观察各种经济社会现象，而且还要肯定人们的价值理想，去伪存真地追求人类社会的本真状态，对以各种假象呈现出来的经济社会现象给予辩证分析和理性批判，而这不仅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为后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学研究奠定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基础。因为 19 世纪中期以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坚持从客观出发的实证主义立场，还是从主观出发的建构主义立场，实质上都不过是片面地抓住了实践立场的一个侧面——而实践观点是坚持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立场。

涂尔干明确地坚持客观立场，坚定地主张把社会事实当做外在的“物”一样去看待。虽然涂尔干对经济现象的论述不像马克思和韦伯等人那样丰富，但他也是从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现象开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也深入地分析了很多经济社会事实。特别是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不仅批判了经济学片面鼓励为追逐私利而展开社会竞争的理性原则，而且对基本的经济现象——劳动分工做了深入论述。他主张把劳动分工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加以考察，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增进效益，而且还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通有无的机会，形成了一种具有道德属性的功能依赖。因此，涂尔干主张，对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分化与整合研究，不能像经济学那样仅仅关注人们的利益竞争，还要研究社会的道德伦理、人们的价值信念以及宗教信仰。

马克斯·韦伯反对涂尔干单纯强调客观性的观点，更反对把社会事实当做物理现象一样看待的方法论原则。韦伯认为人的社会行动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种现象，不过是社会行动展开的不同层面或不同形式，而社会行动又是人们主观意愿发生联系的行动，所以研究经济社会现象就必须关注人们的主观意识，要在对人们的理性原则、思想方式和意识活动的深入考察中理解各种经济社会现象。韦伯论述的社会行动包含了经济学论述的理性选择，只不过经济学强调理性选择是经济人的个体行动，而韦伯则将其上升为社会行动。韦伯关于经济行为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论述，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关于企业的科层制管理的论述，都把对主观性问题的关注作为核心线索或中心主题贯彻始终。

齐美尔在古典社会学中有很特殊的地位，他别开生面地提出要对社会生活开展形式研究，并试图建立一门社会几何学。齐美尔分析了社会生活的交往形式，也包括各种矛盾冲突的形式，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实质是交往形式中的价值原则——忠实。忠实

作为在交往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关爱、诚恳、稳定等，实质上是一种心理状态或精神因素，只有把这种精神因素同交往形式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理解人们的社会行为。根据这个原则，齐美尔把经济的符号形式——货币同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阐述了把经济形式同精神文化和社会交往紧密联系起来的社会学。

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对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追求与思考，但帕累托却与众不同地论述了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帕累托是从经济学转向社会学的，他在研究经济行为时发现，经济行为并非如经济学所言都是根据理性计算进行的，大量经济行为没有上升到理性逻辑层面，相反是在非理性的意识活动支配下进行的。帕累托把支配日常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因素概括为剩余物，它是深层的本能直觉同各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中介，是模糊不定的直觉本能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些非理性层面中的相对稳定因素。实际上，剩余物相当于心理学或认识论中讨论的感性意识。从这个意义上不应当简单地把帕累托归结为非理性主义者，他强调剩余物的地位与作用，实质上强调了感性意识在经济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没有因此而否认理性逻辑在经济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总之，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对经济社会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论述，为经济社会学的现代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实践立场上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从总体上概括了经济社会存在的实践基础、存在结构和矛盾运动；涂尔干和韦伯则分别从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两个方面深化了对经济社会结构或经济社会行为的研究；齐美尔把经济形式同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考察，使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展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帕累托则把被经济学和社会学重视不够的非理性或感性问题提到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之中。

四、现代发展时期的西方经济社会学

20世纪20—70年代，是西方经济社会学的现代时期。在这一时期，有很多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在《论礼物》一书中发展了涂尔干的思想，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指出了在一些时空背景中，经济交易存在互惠性，以族群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是这种互惠交易的基础。从他以及相关人类学家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其他经济模式，并可能对于经济现象获得一种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对于经济社会学而言，人类学家特别是经济人类学家的经验研究与相关思想十分重要。

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在现代经济社会学发展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指出经济社会学要研究制度中的经济行为，经济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现象，家庭结构会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关于经济周期、创新、财政危机等的分析都充分重视了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他从动态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待经济现象，从而把各种社会因素纳入对经济的分析之中，并自觉而充分地表

明了一种经济社会学的立场。

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的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他的《大转折》、《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等著作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属于经济社会学的经典。他指出,人的生存才是最大的经济利益;经济学所分析的形式经济应为实质经济所取代,因为实质经济更能够与自然相和谐,更强调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他认为,任何一种经济系统都应同时存在交换、互惠与再分配三种整合方式,当其中某一种整合形式起主导作用时,另外两种整合方式必须发挥补充作用,也就是说,经济行动必须嵌入社会关系与权威治理结构中,否则将具有破坏性。资本主义那种反对政府与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由体现这种意识形态的法律所支持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终将产生一场巨大的灾难。波兰尼既对经济现象进行了微观的、经验的和历史的考察,又对宏观的经济社会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在现代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他是这一时期明确主张开展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学家。他对当时美国经济学在高校学科设置中占据的过度显赫的地位表示不满,认为需要提高社会学的地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他与斯梅尔塞(Neil J. Semelser, 1930—)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以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子系统与政治、文化系统、整合子系统并列,共同构成整个社会系统。经济行动系统的价值就是在于其适应功能,而个人、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要服务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均衡要求。经济学因此是更庞大的社会研究的一个具体而微的表现。后人认为,他的这种区分割裂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有效的联系与交流,阻碍了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也有学者批评他的分析陷入了一种结构—功能决定论和文化价值决定论的窠臼。

霍曼斯(George Homans, 1910—1989)和布劳(Peter Blau, 1918—2002)等人把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原则引入社会学的研究,也属于这个时期重要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成果。霍曼斯不仅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直接吸收了行为主义心理学、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的人类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在霍曼斯看来,人们在群体中的交换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交换者都是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开展交换行为的,因此,完全可以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加以解释。于是,霍曼斯用成本与报酬、奖赏与惩罚、数量与价值、失落与满足等经济学概念来解释人们在群体中的交换行为。霍曼斯把人们的交换行为归结为经济利益交换,无疑具有以偏概全的失误,但他的贡献在于把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与基本原则直接引入社会学研究之中,可以看做现代时期最典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方式,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两个学科的核心地带实现了连接。

像霍曼斯一样,布劳也把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社会交换行为的理论来源,认为利益交换是人们社会交换行为的本质,趋利避害地追求效益最大化是人们交换行为的根本目的。布劳也用成本、报酬、